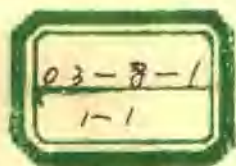


郫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二辑(合订本)



四川成都

编 者 的 话

郫县政协成立之前，郫县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在结合对台宣传工作时，就开始征集了部分文史资料。

郫县政协于一九八〇年十月成立后，组建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即开始全面征集从戊戌变法以来的文史资料，截至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止共收集五百余篇，曾打印刊出《郫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以飨读者。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郫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及时而广泛地开展了征集工作。截至现在已收到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大量稿件，在此基础上编撰《郫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作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专辑。其中有的稿件已在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出版的纪念专辑中刊出。但后来又陆续收到一些有关资料，我们将原稿作了增补、订正后又重新刊出，使历史资料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

为了今后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的方便和保存史料的需要，将打印的第一辑改为铅印，同第二辑合订为《郫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二辑（合订本），以供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的阅读、参考或研究之用。由于我们的编审能力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这本选辑的刊出，得到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郫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郫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前 言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同志生前倡导的一项惠及后世的事业。他曾着重指出：“戊戌以来是中国变动最大的时期”，并号召各界人士将六、七十年来看到的和亲身经历的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以及自己所积累的知识、经验和见闻掌故，通过笔述、口述记录下来，传给后代，“使后人知道老根子”。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因此，我们不仅要系统地了解近百年历史的概况和主流，而且应了解许多历史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演变过程及许多历史人物的事迹。凡参与过去各个时期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社会活动的老人，把自己的亲历和见闻记录下来，为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资料，并对下一代有深刻的教育作用。使我们从生动具体的历史资料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文史资料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组成部份，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中共郟县县委的领导和关怀下，郟县政协于一九八〇年十月正式成立，文史资料的征稿工作随即全面开展，政协委员、各界人士积极参加这项工作，有的笔录亲历见闻，有的采访口碑，有的惠赠先人遗稿及珍藏的资料，截至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止，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共征集资料近300篇，为了更好地保存和积累现有史料，推动我县文史资料征集撰写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决定选编《郟县文史资料选辑》，作为内部刊物，不定期刊印，以飨读者。

我们征集和编印的稿件力求坚持真理，存真求实，不限体裁，不论长短，允许多说并存，相互参证。我们编印《郟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因经验缺乏，水平较低，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赐教，更希望对所编印的史料给予补充和订正，俾史料内容更臻翔实，缜密无遗。

目 录

- 前言.....编者
- 我参加起义前后.....彭友朋口述 杨代明记录整理(1)
- 辛亥革命中郫县新场起义的张心三.....
-陈培堃 田继章 刘安诚 钱光荣(18)
- 郫县临时参议会成立前后.....赵永年(32)
- 原崇宁县参议会内幕二三事.....
-冯公蔚 孙玉川 王慎之 吴达善 尹忠(33)
- 毗河之战片断.....舒开基(37)
- 郫县特产之一 大菸.....罗俊国 张朝钧(41)
- 解放前川西最大的郫县花园场麻市.....周启志(49)
- 宁丰堂的经营管理.....冯公蔚(55)
- 癸亥大水.....张育新(58)
- 郫县最早的电灯.....周显清(60)
- 原崇宁县食盐忆昔.....张育新(62)
- 郫县一、二中校史.....赵永年(63)
- 创办崇宁中学校的回忆.....林藻水(86)
- 旧社会的郫县城关赌场.....陈正修(87)
- 郫县望丛祠建祠史略及展望.....梁文骏(70)

我参加起义前后

彭友朋口述

杨代明记录整理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政府限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办事机构人员撤回延安，随即大举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作出了暂时放弃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略决策。接着，胡宗南于三月二十九日在付出了八个师约四万人的惨重代价后占领了延安。由于战线拉得太长，兵力分布不足，不得不请示国民党中央抽调兵力进行补充。当时我记得被抽调给胡宗南指挥的部队有粤系李振一个军，四川黄隐的九十五军一个师，……其它我就回忆不起了。我就是在这次被调往陕北，后在宜川之战被俘的。

宜川之战

一九四七年六月初，端午节刚过，我所在的新九师师长杨晒轩在川北南江驻地接到命令，要部队立即开赴陕北。由于川军不是蒋的嫡系，装备较差，武器陈旧，没有汽车，马匹亦少，行军主要靠步行。部队到达陕南褒城，胡宗南指挥部将新九师接收后，立即将武器更新，一律配备中正式步枪，还有捷克式轻重机枪，轻迫击炮一个连两门，八二炮一个团四门。从褒城出发到陕北，行军都乘美式军用卡车。

到达前线防区后，确定师部驻黄陵，张辉先团驻淳化，我团驻宜川。我在宜川驻下不久，胡宗南即委派许用修为宜川守备指挥官。许是安徽人，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官，是胡宗南的好

友，此人圆滑，他一到任对我就采取笼络手段，他说：“你们川军打仗很得行嘛！宜川这个地方易守难攻，共军万一来攻亦不怕”。宜川地区归许指挥的兵力除我团外，还有地方杂牌部队雷呵呵残部一个团，实际只有二百多人，原先大部早已被歼灭，其它尚有一个炮连，一个工兵连。在宜川住下一段时间后，胡宗南即派一个检查官来检查防务，这个人的名字我记不起了，当我向他汇报：“士兵吃不惯美国白面，咋办？”他说：“这不是个问题，多吃几顿就习惯了”。此人生活上很讲究，要洗澡，但大洗澡池不愿去，又爱吃酒，难于接待。幸好宜川县长徐沛善于应酬，多亏他出面帮了我的忙，才算应付过去。

一次根据许用修的安排，带了两营人同他一起出巡，耀武扬威转了三天，他下令用轻重机枪向黄河对岸射击，弄得鸡飞狗跳，百姓惶恐不安，路上见不到一个人影，连带路的人都找不到。

一九四七年十月，人民解放军第二、第四两个纵队打下韩城后，即包围了宜川，这时，胡宗南多次来电，飭令要坚决守住。由于官兵厌战，士气低落，加之宜川城周围都是山坡，城外我军据点，兵力薄弱，已被解放军占领，所以只坚守了三天，到第四天早晨，许在电话上通知我，说情况危急，马上突围。到了十点钟，城里乱了套，我即率领团部少数人马向南“冲出”，出城不到两里路，枪炮打得很凶，无法再跑。我身边只剩了几个人，副团长石菱膀上又负了伤；思绪烦乱。就在这时，几个解放军举枪靠近了我们，前边一个象是连指导员，提着枪问我是谁，我和石菱都如实说了身分。他即分付身边的解放军战士说：“不要乱打枪了，要好好保护他们。”并叫我们就地坐下休息。大约等了几分钟，便叫我们倒转回城，路上碰

见二纵队司令员王震与政委王恩茂，王震司令员指着我问连指导员：“他们是谁？”连指导员说明了我们的身分。王震司令员说：“那就把人交给我吧！”并写了收条。这时，我心存疑虑，究竟被俘后如何对待？但从我与王震司令员的初步接触，使我终身难忘。

王震司令员见石菱膀上负伤，立即在身边摸了一包进口消炎片，叫石菱口服数片。并叫身边的军医给石包扎伤口。接着转身拍着我的肩膀说：“受委屈了！这怪不得你们，要怪蒋介石，你们吃了他的亏”。王司令员没有一点官架子。就这件事，还有一段插曲。一九四七年底，我身边的警卫员刘雨朋从解放区回到四川老家崇宁县，向我爱人刘玉书诉说：“你不要耽心，彭团长在那边有熟人，我亲眼看见有个解放军高级军官对彭团长毫无敌意，还热情地和他谈话哩！”。使我爱人心情上得到了宽慰。这都充分说明共产党、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是何等英明正确啊！

同王震司令员一起，回宜川城途中，恰逢国民党飞机临空，于是大家就在路边屋檐下暂避一下。这时，王司令员笑着说：“这个是规律，每当战斗一结束，蒋介石的飞机就来了”。他又说：“这个卖国贼从地面卖到天上，从陆地卖到水下”。意思是说，连领海领空都卖给帝国主义了。飞机飞走后，大家一起到宜川县政府。小憩一阵，随即就餐。我记得是两张方桌接起，菜肴比较丰盛。解放军方面入座的有干谔司令员、王世泰司令员，王恩茂政委和一个头部负轻伤的张参谋长，还有几个旅长作陪。被俘人员入座的有许用修、徐沛、石菱和我。我们几个人有些拘束，倒是徐沛善于应酬，他主动敬起酒来。席间，由于解放军指挥员们谈笑风生，气氛就比较和谐起来，使我们心里更加安定一些。饭后，由一个姓白的军务干事，对我

們的住宿作了妥善安排。晚上，我們還互相開起玩笑，異口同聲地說：“這下真是無官一身輕了！”。

在宜川住了兩天，胡宗南增援部隊趕到，由於解放軍採取以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的運動戰，第三天便主動撤離到黃河對岸。所繳獲的大量武器彈藥，均一齊運走，過黃河後，便向呂梁軍區進發。在路上，王震司令員與我們談話比較隨便，我見王震司令員在看《孫子兵法》，便說：“王司令員很有學問嘛！”他謙遜地說：“我們這些人就是書讀少了。你們四川的郭沫若先生學問才算淵博哩！”。接着他又同我們親切交談，自我介紹說：“我老家在湖南，家里是個佃農，十几歲就參加革命，在鐵路上當過工人，母親現還在湖南，前些年，國民黨地方當局曾逼問過我母親：‘你兒子有沒有信回來？他在外面當共匪你知不知道？’”他母親說：“我兒子沒有信息，也未寄過錢回家，他不是匪！”王司令員話匣子拉開，從南泥灣大生產運動談到前兩年率一旅人深入到蔣管區南方幾個省的經過。這次接觸，時間雖短，卻在我思想上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在呂梁軍區所在地，一次我問王震司令員：“我們好久才能回去？”，他說：“你們不要耽心，來一次很不容易。既來之，則安之。不要虛此一行，參觀一下解放區，開開眼界”。不久，我們參加過一次部隊召開的數千人大會，紀律秩序之好，我還沒見過，實在令人敬佩。後又參加過一次群眾大會，還請我們在主席台上就座，當時我內心既感動又慚愧。就在這次行軍途中，一次在軍區聯絡部剛住下時，由於炊事員尚未趕到，聯絡部部長張平的愛人見我們還沒有吃午飯，便主動給我們按中灶伙食標準弄飯吃，而她自己則吃大灶。又一次一個姓門的汽車隊長，是四川內江人，在抗大學習過，他在司令部見八縱隊司令員王新亭的愛人在打手套，便像小孩似地笑着說：“嫂

子，这双手套送给我好吗？”王司令员的爱人很大方，毫不犹豫地：“给你，拿去吧！”。从这几件事使我感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官兵、军民、上下级是水乳交融、情同手足的关系，和国民党统治区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一天，王震司令员通知我，决定让我到陕甘宁边区教导团参加学习，并由他亲笔写了一封介绍信，我至今还回忆得起信的封面上是这样写的：

解放军官彭友朋面呈

总参谋长叶

钧启

职王震 谨肃

我奉命到晋绥边区第二野战军第八纵队军区教导团参加学习，他说：“那里的生活条件要好些”。于是我又和王震司令员同路，乘车三天到达第八纵队军区驻地阳城。由司令员王新亭、付司令员刘忠接待我们，并找了些书报给我们看，又给我们换发了解放军军装。第二天，由刘忠付司令员陪同，有我、许用修、石菱等七人上了浏览了阳城市容，见市上生活用品等物资比较丰富，一片繁荣景象。回到司令部，刘忠付司令员说：“我们解放区要土气一点，尽是土特产不象蒋管区那样，是美货充斥的玻璃世界”。

三天后，我们动身到邯郸，离学习地点永年县尚有一百华里。在邯郸由军区政治部吕主任接待我们。第二天，由王震司令员陪同，有我和石菱等四人，会见了陈毅司令员，二野战军的参谋长王世英在场，只见桌上摆了些水果。陈毅司令员谈话平易近人，一开始就说：“我叫陈毅，是四川乐至县人，我们原来都是旧同事”，（陈原在川军二十八军陈书农师政治部任过科长，一九二七年离开）。接着，他向我们讲了国际国内形势，最后他笑着说：“你们是职业军人，回去还可以干，但不要死打硬拚就

行。替蒋介石卖命，刘不来，你们回四川后，请代我向邓晋公、黄逸公问好”。（指向邓锡侯、黄隐问好）。谈话结束，还同我们一起聚餐，并摄影留念。会见的时间虽然不长，可以说是语重心长，和蔼可亲，对我触动很大，教益很深。

在邯郸住了两天，便起身到了晋冀鲁豫教导团驻地永年县报到，地址是原永年中学校，我和石菱、许用修编在第一大队，整个教导团共有学员一千多人。大队以下设有班、排。班排长由学员担任，我们第一大队共有学员一百多人，其中阎锡山的军官不少，而且多数是师级以上，如宋瑞科是国民党六十六军军长，陈一昆是七十二军军长，而我自己则是团级，与他们在一起，有些不相称，因此曾产生过情绪。但这个大队，生活标准高，安排有水饺、馒头、面条、羊肉、鱼肉等，对这点其他大队还提出过意见。总队部还作了思想工作，整个学习的安排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学习内容有关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土地法大纲》等著作。学习方法是先阅读，然后联系思想实际讨论。在半年的学习期间，我初步认识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劳动人民生活贫困的根本原因；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摧毁国民党的腐朽统治，中国才能独立富强，繁荣昌盛。体会最深的是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与团结开明士绅的政策。使我感到革命并不可怕，关键看你站在那一边？学习到最后阶段，我思想认识有所提高。以我在川军邓锡侯的二十八军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同事、朋友关系多，所以在总结时，我表示回川后可以作些工作。将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真理广为宣传，有机会还可以策反。最后总队部开了欢送会。期满结束，石菱自愿留下，便安排他在石家庄步兵学校任教员。我因有家室牵挂，思乡心切，同意我回四川的要求。临行前，王伯萍团长和周政委都热情地勉励我，说我

学习比较认真，思想有所转变。我回答说：“我学习虽然有所进步，但在认识上还是很差的。”接着大队长馬冠英又鼓励我说：“要讲革命道理，十年八年也讲不完，期望往后还能见面”。整个学习从农历十月到第二年四月中旬，便告结束。

返川前后

在我临行时，教导团的大队政委李旭昌很关心地对我说：“为了你的安全，这次你返川路线，我们作了妥善安排，不走武汉方向，选择西安这条路好一些”。这样，我们一行四人到了阳城，王新亭司令员在政治部接见了我们，并请我们到教导队参观座谈。在那里见到了参加学习的原我团排长、司务长、士兵等。大家都很高兴，齐颂共产党英明伟大，痛斥国民党腐败无能。我看见他们生活过得很好，心情比较愉快。在韩城休息了两天，受到县长的热情接待。临行时又安排六人与我们同行。离开韩城，才走了半天路程，就到了蒋管区，国民党警戒兵进行盘问，我们说：“从共军那里跑回来的”，于是便带领我们到一个村子的坝子里坐下，由一个军官给我们讲话，意思是想收编我们。我说我们是友军，才算了。第二天放走了我们，不久就到达我原所在部队新九师辖区。在西安住了一个晚上，翌日即乘火车到了三原县新九师师部驻地，原师长杨炳轩已调走，由新任师长于戒虚出面欢迎。接着开了一个座谈会，有十多人参加，胡宗南派来的政工处长王冠三也在座。我为了应付，说了一些引咎自责的话，并有意地说：“宜川之战吃了败仗，我认为主要是共军惯用乘其不备，以大吃小的战术；若加以注意，我们还是可以取胜的”。刚说到这里，王冠三便打断了我的话，说：“希望下次座谈时，请你讲得条理一些”。看来，他对我的话是不满意的。休息两天后，我便动身经宝鸡到

四川广元九十五军军部驻地，见到军长黄隐，黄亦没有怎么进行责怪。我说：“这次陕北吃了败仗，我应负责，没有给军长争光”。黄说：“这不完全怪你”。我又说：“那边陈毅司令员要我转达对你的问候”。黄思索了一下，没有说什么，便叫我暂回成都休息一段时间再说。临行时，给我几万块法币作路费，于是我亦没有久留，第二天就到达绵阳。新九师第二团团团长胡志超设宴款待了我。接着，回到了成都以后，一二六师师长谢德堪主动邀请我到 he 家里聚会。有他的副师长周炳清在场。谢问我：“究竟共产党、解放军怎么样？”因人熟关系，我便直言不讳地说：“我方太腐败了，如果老办法不改，长此下去，始终打不赢”。隔两天，邓锡侯接见了。这时，邓所任的四川省主席职务已被撤了，改任有名无实的川陕鄂绥靖主任。与邓见面时，我首先作了检讨，邓不在乎地说：“连西北王胡宗南都打不赢，谁打得赢？”。我又补充说：“陈毅将军还问候你呢！看来他对你很关心”。邓默然不语。我又问邓：“新职何时就任？”邓说：“还未考虑”，邓接着说：“我周围有蒋的特务活动，今后有事不要直接找我，有话可由牛范九转达”。我晓得牛是邓多年的亲信，现是绥靖公署参谋长。隔两天，牛范九极热情地约见了。他对解放区的见闻，问得很详尽。他问我：“人海战术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是反宣传，是造谣，共产党是热爱士兵的”。我接着又向牛讲：“看来蒋军必败，共军必胜已成定局，替蒋效忠，前途渺茫”。并以曾在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任过南郑（汉中）镇守使、抗战时任过国民党军长的赵寿山，在一九四六年起义后，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的事例说：“如果邓晋公投向人民，其地位可能与赵不相上下”。牛又问我：“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如何？”（我了解牛范九有个儿子在解放区，

是燕京大学毕业的，他提出这个问题，其内心是可以理解的）我说：“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是器重的，我在解放区碰见四川老乡不少，我曾会见过一个广安人，是大学生，现在抗大担任教员哩！”牛还问我，解放区生活怎么样？我说：“物资比较丰富，生活亦很安定。没有乞丐，没有妓女。有钱有地位的人，只要不反对共产党，就会重视你，团结你。延安有个开明士绅李鼎铭就当上了参议长。宜川有个开明士绅姓韩，也是参议长。”牛范九听了这些新闻，虽未表态，但从他的面容神态看，是有所触动的。

在成都逗留的几天中，曾在新九师副师长龚渭清的公馆里会见一些老同事、旧相识，在座的有王文鼎（中医、中共地下党员）、严啸虎（成都市警备司令）、韩伯诚（长美轩饭店经理）、黄绍猷（曾任过旅长）、黄锡轩等。摆谈局势时，其观点各不相同。当谈到时局时，我说：“看来大局已定，国民党中央要想挽回局势是不可能的”，黄绍猷说：“只有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才能改换局面”。我说：“希望甚微，如果真的爆发三次世界大战，也只会对共产党有利；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东欧不是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吗？”黄绍猷不同意我的看法，接着大家亦没有争论，气氛顿时陷于沉默，后来不欢而散。几天之后，一二六师副师长周朗清，师参谋长黎世雨为了避开耳目，约我到东外望江楼，在那里包了一支小船，划船闲谈。他们问我“阶级觉悟与政治觉悟的含义如何区别？”我说：“这个问题我亦不大说得清楚，不过我认为阶级觉悟是指劳苦大众而言，政治觉悟要广泛一些”。

西安“消毒”

我因思家心切，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中旬，由成都赶回崇

宁。自宜川战役被俘，与亲人隔绝已有一年，现又团聚在一起，全家人有说不出的高兴；再则长途日久，亦需要休息。在家约有两月光景，即在中秋节后几天，接到九十五军军部来电，转奉国民党中央成都行辕下达的命令，叫我从速动身到西安军官总队受训。看了电文，吓了我一大跳。因为我知道名曰“受训”，实叫“训毒”，弄不好后果不堪设想。我便立即前往成都打听情况。有人告诉我，既然上面已作决定，不去不行；如果不去，谨防强行被抓起来，然后用飞机解送南京，结果凶多吉少，反为不妙。给我反复考虑，认为去为上策。于是我立即前往行辕办理动身手续，当即被通知与罗成松、徐庆凡两人（营长级）一路前往。起程后，在绵阳休息两天。到了陕北三原县，我即到新九师师部找师长于戒虚，向他说明去西安的原因。于说：“没有关系。第七补给区程椿生司令与我交往密切，程又与西安军官总队队长王应尊关系较好，这个忙可以帮”。于是，找程椿生写了一封信由我带上，叫我面呈王应尊。到了西安，我便先去会见王应尊，王对我态度很好，马上写一张条子，叫我去找军官总队的指导员，（那个指导员的姓名我回忆不起了）。他一见条子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还请我吃了饭。第二天我也回敬了他。报到后，因总队部人多，短期内尚不能住进去，经总队部同意，只好同罗成松、徐庆凡一起在终南山脚下，黄帝陵侧近一个叫“引驾回”场镇的旅馆住下来。隔两天去总队部参加一次集中学习，然后分组讨论，讨论中心记不清了，仿佛记得有人讲过：凡是逼上梁山的都不是好人。由于有特殊关系的原因，我始终住在外面，没有住在队部。一次，那个队指导员与我闲谈时，有意识向我透露，严冬将至，想买点杠炭，供家里烤火需要。我明白他的用意，本来我就想过有机会要献点殷勤讨好他。于是我就立即掏钱托人买了二百五

十斤打炭，送到他家里。果然奏效，没几天，他就亲口对我说：“通过学习，你认识态度比较好，可以写个反省书，表个态。”这时我心里真是异常高兴，立即找营副官杨清源帮我代写一份违心的有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那样措词的反省书在**墙壁上贴起**。大约隔了十天，就接到通知，调我和罗成松、徐庆凡回新九师另有任用。这样我就迅速回到新九师驻地三原县。于戒虚师长向我祝贺。我说：“谢天谢地，多亏你的关照，才使我脱离那个鬼地方。”在三原县休息了一个星期，一天，于戒虚将一封由南京发来的电报给我看，说是在军事委员会工作的一个侄儿于浩章发来的，内容是：“得悉南京军委已决定正式将新九师拨给胡宗南指挥，由九十五军另建二二五师填补”。问他叔父愿不愿意当二二五师师长，于便征求我的看法。我说：“以局势发展来看，当然回四川任二二五师师长是再好不过了”。于亦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一九四九年元月我离开陕南返回四川，回到家乡崇宁县。农历正月初，接到于戒虚的来信说：“上次那封电报内容，已由南京国防部正式发出命令，成为现实”，并说“二二五师副师长一职，拟由吾兄担任，具体的安排等几天在成都同黄军长见面时再定。”接信后我考虑自己在解放区那段经历，感到替蒋效忠，与人民为敌，是决不能再干了，便写信婉言推辞，不愿再担任军职。隔几天于戒虚回到成都再三相邀，我只好同他一起到黄隐军长家里晤谈。黄说：“老同事嘛！人熟好办事不要再推辞”。刘登选亦劝我说：“下边都希望你能出来”。于戒虚也说：“你不干，想当的人，大有人在，希望你不要再推辞了”。经我反复思考，心想，有个名义也好，免遭他人怀疑。反正我心里明白怎样应付局面，最后只好勉强同意。

正月初八这一天，二二五师正式在成都成立，除由于戒虚